

女儿朱敏、女婿刘铮谈父亲朱德元帅

留下外孙 把女儿女婿“赶”出中南海

初春4月,阳光明媚。记者来到北京市西直门附近的一幢普通住宅楼。一进门,映入眼帘的是一尊朱德元帅身着军大衣的半身塑像,四周摆满了绿叶盆景,顿时让人感受到一份有别于平常人家的庄重。

“你们来啦,快进来吧。”一位慈祥和蔼的老人把记者带到客厅,他是朱德元帅的女婿刘铮。他的夫人、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朱敏正静静地坐在客厅里等候记者。近年来,朱敏身患多种疾病,患脑血栓和股骨颈骨折后,她已很少出门。

在客厅,朱敏与刘铮,两位年逾80的老人,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心目中的父亲——80年前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。



左图:1951年,朱敏与父母在青岛(资料照片);右图:刘铮为《我的父亲朱德》一书签名

月1日起义时,贺龙指挥20军攻打驻藩台衙门的朱培德第五路军总指挥部时,就是按照朱德画的地图进攻,很快把五路军总指挥部门前的两个碉堡拿了下来。

起义中,朱德并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。起义军主力11军辖8个团,由叶挺指挥;20军辖6个团,是贺龙的部队;朱德率领参加起义的有军官教育团3个连和南昌警察局2个保安队,500人不到,只能算一个营。然而,朱德巧使“调虎离山”计,设宴拖住了敌人的两个团长,使敌人的两个主力团失去指挥,保证了起义顺利进行。

后来,周恩来谈到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时,称他“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”。

1928年1月,朱德、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剩余的部队在宜章发动“湘南暴动”。随后,朱德、陈毅率部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,建立了红四军,朱德出任军长。1930年,朱德成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,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。此后几十年间,“总司令”是朱德



在党内、军内的代称,他于1946年至1954年期间,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。

接受“任务”

康克清“考察”未来女婿

退休前,朱敏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任教,“其实,我在苏联学的是教育心理学。”朱敏说,报考教育专业,是她在战争年代目睹许多孤儿悲惨境遇后立下的志愿,然而,由于从小在苏联学习成长,“中文没有俄语好”的朱敏后来改教俄语,一辈子都在为教育事业默默奉献。

在苏联学习期间,朱敏不仅学有所成,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。

1949年,在一次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的联欢活动中,朱敏认识了大使馆工作人员刘铮,而且第一眼就对这个“个头瘦高、面容英俊”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比朱敏小1岁的刘铮,是解放区外语学校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,因为俄语学得比较好,新中国成立后跟随王稼祥大使赴莫斯科,参加大使馆筹

建工作,负责安排中国在苏联留学生的生活。

在朱敏眼中,刘铮“工作认真积极,为人随和”;而在刘铮看来,朱敏“善良正派,没有架子”。于是,两人在不断交往中擦出了爱的火花。

“在这期间,她还考验过我。”刘铮说,“当时朱敏有几个关系好的同学想帮她试探我,看我是不是真心喜欢她。她们用一个小计谋,派了另外一位女同学来向我示爱,经常找我去谈话,试试我有没有三心二意。结果,试探没成功,我经受住了考验。”说到这里,老人哈哈大笑。

刘铮忐忑不安地等待朱德的认可,“我们结婚是通过层层审查的,很不容易。”

1952年,朱德夫人康克清参加世界妇女大会后,率团访问莫斯科,朱敏也随团参加活动。“康妈妈一直询问我的个人问题,这是爹爹交给她的‘任务’。”原来,朱敏与刘铮在苏联谈恋爱,消息传到了朱德的耳朵,他和天下父母一样,既高兴又有些担忧,于是让康克清到莫斯科访问时,趁

机问一下情况。

听到朱敏表态后,康克清让大使馆安排刘铮送文件给她,借机见了这位未来的女婿,并和他交谈了一会儿。“刘铮走后,康妈妈对我说:‘刘铮是个不错的小伙子,我代表你爹爹表态,同意你们的婚事!’”朱敏知道,父亲一定会尊重自己的选择,特别是婚姻,让自己做主。

1952年底,朱敏与刘铮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婚礼。

留下外孙

把女儿女婿“赶”出中南海

结婚一年后,朱敏毕业了,两人回到祖国,与朱德一起住在中南海。

“我直到回国后才第一次与岳父见面。”刘铮回忆说,“那时候我感觉很拘束,因为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位开国元勋。在回国前,朱总司令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非常崇高的形象。但接触以后,发现老人家非常祥和,非常朴实。他一再嘱咐我们:‘家里的事不要你们操心,一定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,有什么困难,都可以提出来,我们尽量地帮助你们。但是你们也要尽量地俭朴,要自力更生,靠自己维持家庭生活,照料你们自己的子女。’”

朱德元帅自己的生活也十分简朴。“一日三餐,一般就2个凉菜、一荤一素2个热菜,再加上稀饭和馒头等。”刘铮对岳父的勤俭印象深刻,“老人家特别喜欢吃四川泡菜,几乎每天晚饭都要吃。”

朱敏印象最深的是,父亲在哪儿都要“开荒”:“爹爹无论住在中南海还是玉泉山,都会在房前屋后种点蔬菜瓜

果,他和康妈妈自己动手,刨地、播种、锄草、浇水、施肥。”朱敏说,这是父亲对晚辈们最好的言传身教。

回到北京不久,朱敏的第一个孩子刘建就出生了,这让年近古稀才当上外公的朱德喜上眉梢:“就叫‘建建’吧,现在建设社会主义,将来建设共产主义。”事隔多年,朱敏仍然清晰地记得父亲那天高兴的模样:“爹爹把婴儿小心地托在手掌上,戴着老花眼镜,仔细地端详,久久不肯放下。”

然而,就在朱敏休完产假,刚到北京师范大学报到上班不久,她和丈夫刘铮就被朱德“赶”出了中南海。

“爹爹提出来,你们刚回国时不习惯,在我这儿多住一段时间,但你们现在逐渐习惯了,要学会自力更生,提高自己自力更生的能力,应该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去住。”朱敏一开始有点儿想不通,这不是挺方便的,也没有什么特殊性,干吗要让我们单独生活?“爹爹知道我们的心思,就对我们说,我们和他一起住在中南海,生活太优越,容易脱离群众。他希望后代都自重自立,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。爹爹还说,孩子可以留在他们身边,他和康妈妈来管,我们不用操心这个事,只管做好自己的工作,到单位去住,和单位的群众打成一片,互相学习、互相帮助,对自己进步有好处。”

于是,朱敏与刘铮各自搬到单位的集体宿舍,每逢星期六晚上才回中南海与家人团聚。过了几年,北京师范大学给朱敏分配了一间单独的房子,刘铮从外交部的集体宿舍搬了过来,两人这才有了自己的家。《新民晚报》供稿

摸清敌情

亲自绘制兵力部署图

尽管从小不在父亲身边长大,但朱敏非常了解朱德元帅的戎马生涯,“老人家曾经和我们说过革命时期的一些事情,我知道,南昌起义是爹爹第一次以中共党员身份参加领导的。”

1927年7月21日,朱德秘密由武汉返回南昌,主要任务是了解南昌的敌情,准备武装起义。他把敌人的兵力、指挥官的特点和部队布防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,还绘制了一幅详细的敌兵力部署图。8

贾若瑜将军独家讲述恢复军衔内幕

“和平时期,军衔授到上将为止”

缔造人民共和国的将帅们大多已离我们远去,但他们头戴闪耀着“八一”红五星徽章的大檐帽,身穿双排扣将帅礼服,胸前勋章与肩头星花交相辉映的英姿永存人们记忆当中——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,向全中国、全世界广泛传播了开国将帅们的传奇人生和不朽功勋,更通过摄影家手中的镜头,把他们的魅力和英姿,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和世界军事史上永远定格。

军衔是区分军人等级、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、标志,也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到建军27年后,才正式全面实行军衔制度。这次军衔制于1965年6月1日被取消,23年后恢复。

在迎接建军80周年的日子里,记者来到北京颐和园后一幢静谧的小楼,采访开国将军贾若瑜。

今年已92岁高寿的贾老戎马一生,在他1931年参加革命以来的履历表上,记载着一长串军官职位和军事职务,其中“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兼办公室主任”这个头衔,引起了记者特别的兴趣。

身着纯棉便装和布鞋的

贾老依然保持着职业军人气质,更让记者吃惊的是他的记忆力。作为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重要一员的亲历者,贾老对全军恢复军衔制的整个过程至今记得清清楚楚。

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

1983年初,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副院长的贾老接到中央军委发来了任命书: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。

“要搞军衔制”,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于1980年3月12日提出的。贾老回忆道,当时,随着我国对外开放,人民解放军的对外交往多了起来,“我们出国去,人家有军衔,我们没有。无论官兵,军装上都是一颗红星,两面红旗”,很难与对方进行对等的谈判和交流”。更重要的是,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需要恢复军衔制。

贾老告诉记者,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,中央军委成立了“全军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”,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直接领导。领导小组共有近10位成员,都是军委各总部和直属单位的“头头”。

在“军衔办”紧张开展工作的同时,1984年5月31日,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》作出规定:“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”。1985年6月,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,明确提出“实行新的军衔制”。

军衔设置变成了三等10级

新的军衔制如何具体实施?贾老复述了邓小平同志当年亲口说的两段话:“和平时期,军衔设到上将为止。”“军衔以上,一职三衔。”小平同志曾解释:“军衔以上实行一职三衔,道理很简单,年轻干部需要培养,他们的军衔可以低一些,职务可以高一点。”

于是,新起草的军衔制条例对1955年编制的军衔制等级设置作了调整。贾老告诉记者,“原来是将、校、尉各4级,有大、上、中、少,加上元帅是2级,一共四等14级。这次调整中取消了元帅;取消了大尉和大将,改为尉官和将官设大、中、少3级;校官仍设大、上、中、少4级。军衔设置变成了三等10级。”

贾老介绍,和平时期军衔等级简化,规格一般不太高,这也是世界各国军衔设置的惯例。贾老还强调,军衔制条例的编制和起草非常复杂,从办公室成立到1988年再次授衔,准备工作进行了整整5年。

地方干部兼军职一律不授衔

兼任军职的地方干部授不授衔,是军衔条例起草过程中遇到的一个问题。贾老说,当时有一位很重要的同志向军委提出,兼任军职的地方干部要授衔。

“这个问题就大了!”贾老加重了语气。当时,省委书记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,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委,县委书记兼任武装部政委。如果要授衔,省委书记应该授少将,中

军官军衔现行标志



将,地委书记授大校,县委书记授上校。“虽然兼任军职,但他们是地方工作为主,你在这个地方担任政委的他授了衔,他调到另一个地方的部门工作,不担任政委了,他也戴上个军衔?”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“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一起,在人民大会堂专门召开会议。会上,小平同志一言九鼎:地方干部一律不授衔,一律不穿军装;可以不担任政委,只担任军队的党委书记,负责解决协调当地党政军方面的工作问题。”

医院护士到底授不授衔?

在“军衔办”工作的日子里,贾老和办公室的同志们跑遍了各大军区、省军区、野战军和各总部大单位。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,在全军广泛调研,大范围听取并在《条例》中吸收了部队官兵对授衔的意见、建议。

贾老说:“部队各有各的意见,总部里、机关里的意见也不一样。”贾老举了一个例子:军医院的护士授不授衔,

就有不同意见。“有的同志赞成授,有的赞成授文职。”最后,《条例》听取了大多数人的意见,护士授文职。

开国将军对授衔很高兴

1988年7月1日,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》,予以公布施行。同年9月14日,中央军委在北京举行授予上将军官军衔仪式,洪学智等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。10月1日,人民解放军正式实施新的军衔制度,共授予尉官军衔40.5万人、校官军衔18万人、将官军衔1452人。

身为1955年被授衔的少将,又负责“军衔办”工作5年之久的贾老,因为年龄关系,已无缘再获新的授衔。当看到资历比自己浅、年纪比自己轻的军官们获得比自己更高的军衔时,贾老是怎么想的呢?

“不仅我自己没有任何想法,老同志们中我也没听到过任何意见。大家都为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又向前迈了一大步感到高兴,为获衔的同志感到高兴。”贾老回答得很干脆。

贾老的革命记忆

“我15岁参加革命时,组织上对我讲了三句话,至今牢记在心。第一,参加革命是光荣的;第二,参加革命是会有牺牲的,但是牺牲的是你还是我,很难说;第三,革命是我肯定要胜利的,但是你看胜利还是我看到胜利,很难说。”

还有一连串浸透了鲜血的数字,一直铭刻在贾老记忆当中:我在白区工作时,贵州赤水县党团员加起来80来个人,到全国胜利,剩下不到10个人;长征前,我们这个部队从湘、鄂、川、黔出发时,是1.3万人,途中扩大了1万来,到陕北时,我们是保持军力最好的,也只剩下了1.1万人;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,我在胶东,我那个军区的烈士有名有姓的是7万来,整个山东是20万来。我们是幸存者啊,是幸运者啊!要比,就要和牺牲的烈士们比!”

《新民晚报》供稿